

SHUXIN DAQUAN

书信大全

陈五云 主编



SHANGHAI

JIAOYU

CHUBANSHE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77214

书信 大全

SHUXIN
DAQUAN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27841

陈五云主编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07号

书信大全

主 编 陈五云

编写者 陈五云 王 捷

刘民钢 杨 颖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123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 插页4 字数 249,000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300本

ISBN7-5320-2353-2/G·2288 定价: (精)6.35元

关于书信的林林总总

——代 序

书信,对于我们说来,是个极为熟悉、极为可亲的词儿。杜甫留下过这样的诗句: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在社会动荡,战乱频仍的年代,一封家信,可以给亲人几多慰藉,是可以想知的。即使在和平岁月,书信也时时刻刻维系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,在人与人之间起着交流思想、传递信息的作用;出门在外,靠书信报平安,寄托自己的情思,安慰家人的怀念;亲朋好友,以书信往来问候;情侣的互诉衷肠,夫妻的嘘寒问暖,长辈的谆谆教诲,晚辈的勤勤问安;师友往来,学术讨论,酬人谢赠,恳托拜请,荐举求职,咨询答疑……书信的应用是如此广泛,书信的作用是如此重要,也就难怪人们熟悉它,亲近它了。

然而,对于不少人来说,书信是陌生的,疏远的。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。

若干年前,一位六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,通过朋友的中介,结识了一位女友。几番往来,意气相投。这位青年搞到了两张戏票,由于电话老是占线,就写信邀她。谁知一封信断绝了两人的交往。原来,她在读信之后,感到文字功夫太差,与“高中毕业”的资格不相符合,怀疑介绍人在介绍时掺了水份,于是断然分道扬镳。

还有一个动乱年代的可悲笑话:某知识青年从他插队落户的

乡村给父母写信，述说他准备“上吊”的情况，急得父母迢迢千里赶到乡下。原来，儿子并非上吊，而是准备“上调”，一字之差，险些闹成人命案子。

有些书信寄出之后，寄信人就等着回音。但往往有这样的情况，信件根本无法到达收信人手中，其中一部份，由于信封写得不规范，成为“死信”，留在邮局之中。因而，回音自然杳如黄鹤。

最近，一位年高德劭的老教授向某大学中文系提出这样的要求：“有些青年人给我来信，信封上连个称呼也没有，就只称某某某，这种现象，你们中文系也该出来管管！”

可见，这些青年，对于“书信”这个词儿是陌生的，疏远的。书信没有带给他们以安慰，以鼓励，反而常常带来苦恼和麻烦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截然相反的情况呢？

因为，说到底，书信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工具。一种工具，由于使用者本身的原因，在使用时都会带来正负两方面的效应。而书信又不同于一般的工具。它是以文字为基础的，它所输出的信息量，远比书写者想输出的要大得多。书信在传递信件内容的过程中，也把写信人的其他信息一起送了出去。从收信人看来，除了信件内容外，他还能从行款、称呼、字迹等非主要信息中判断对方的文化素养。正确的行款、恰当的称呼、妥贴的词句、工整的字迹与内容相配合，往往会博得对写信人的好感，与对方在思想感情上取得一致，从而达到通信的目的。——这是正效应。反之，写信人不顾书信行款，不考虑收信人的身份地位或与自己之间的关系，采用不适宜的称呼，在遣词造句上辞不达意，语气生硬、白字连篇，乃至字迹草率而不规范，这样的通信就很难达到目的，甚至出现负效应——前面的例子就是。

可见，书信这种工具的使用是大有讲究，也是值得讲究的。

了解书信的作用，懂得一些有关书信的知识，多读一些优秀的

书信，——对于掌握和运用好书信这一工具，是十分有益的。

书信名称的由来

书信，是现代的名称，一般又叫作“信”。

然而，古时候，“书”和“信”却是两回事。

按照汉代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，“书”和“文”、“字”是同义词，但又有所区别：“依类象形谓之文”、“形声相益谓之字”、“著于竹帛谓之书”，文字是指字形，书则是指写字的过程，因此“书者如也”，书就是写。把文字写下来叫做书，由文字组成的文章也称为书。文字的作用是把语言通过字形的媒介由此地传到彼地，由现在传到将来，所以古人把书认作传递信息的工具。一般说来，书特指书信，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应用文。在古代经典中，有一部称为《尚书》的，又称《书经》，是古代文告的汇集，这类文告，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书信——公开信。传说中的鱼雁传书，就是传信的意思。

也是依《说文解字》的说法，“信”的本义为“诚也”，就是真诚、不欺。由真诚引申为信用，再引申为传递消息的使者。古人把送书信的人叫做信，或称信使。在唐代以前，一般人说到“书信”，还常常把书、信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前者指书札，后者指送信人。唐代以后，“书信”渐渐变成了现代的涵义。

书信被称作书札，是由书的形制决定的。古代书写没有纸，用简帛。相对说来，简是比帛更为广泛更为便宜的“纸张”。简用竹木制成，札就是木简。一般说，简是长条的竹片，札却不妨宽一些。札又称为版，版原是木片的意思，也称为牍，牍就是书版。汉代规定，诏书写在一尺一寸长的木版上，称之为“尺一牍”，后来省称为“尺牍”，用为书信的通称。由此，我们知道，尺牍、简、书简、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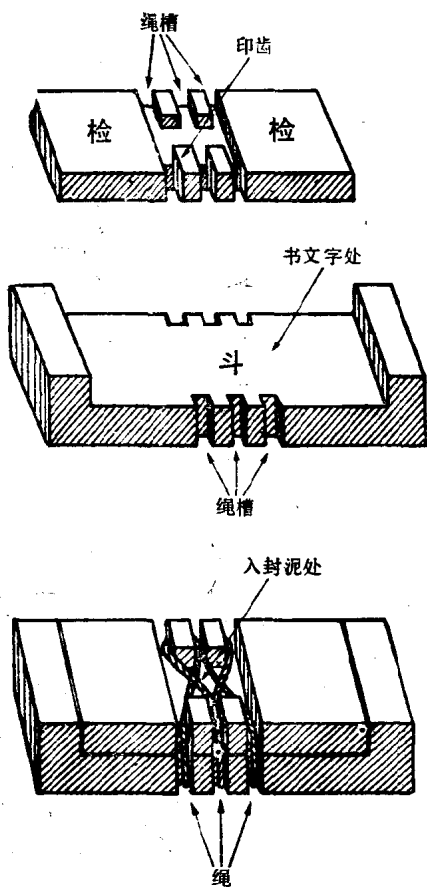
札都是书信的别名，而这些名称的得来都是由古代的书写工具决定的。

把使臣叫做信，是由于他担负着传递信息的使命。传递的形式可以是口信，所以《左传》里把“信”字解释成“人言为信”。但有了文字以后，使臣传递的往往就是书信了。用文字传递消息，可以更真实地传达写信人的意思。但是，既然通过第三者来递送，就不免掺假作伪；而且，由文字写成的书信，其内容或有关国家大事，或有关军事行动，或有关个人私事，都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。怎样来检验书信的内容是真的或没有泄漏呢？于是有了把信封起来的必要。

早在先秦时代，人们就开始以印章作为凭信，来证明送信者的身份和书札的可靠性。印章也称为玺印或印信，原是用来挂在衣带上表明身份的，战国时代的苏秦，就曾佩带着六国相印衣锦还乡。后来，人们又以玺印用到书简上，成为书简的凭信。《释名》：“玺，徙也，封物使可转徙，而不可发也。印，信也，所以封物为信验也。”把玺印看成封物的标志。

汉代已经广泛地使用玺印来封书札。具体的做法是斗检封。所谓斗检封，是用两块木板，一块做成凵状，托在底下，称为“斗”；一块嵌在斗的凹处，称为“检”。斗和检的中腰，各有若干绳槽，互相契合。在检的中央，又有一方形孔。书札就置于斗中，上覆以检，用绳子沿绳槽按一定格式捆好，然后在检的方孔中注入青泥，署上玺印。（图一）这个捆扎封署的过程，称为“緘”；用泥封上方孔，称为“封”或“封泥”；盖上玺印，称为“署”。书札有时不止一块，用斗检封就不方便。人们又用囊袋装入书札，同样用绳緘口，署上封泥。这种书套又叫做“函”。因此，人们也把书信叫做“书函”或“函札”。

有了封泥和玺印，收信人只要查看封泥是否动过，就可以辨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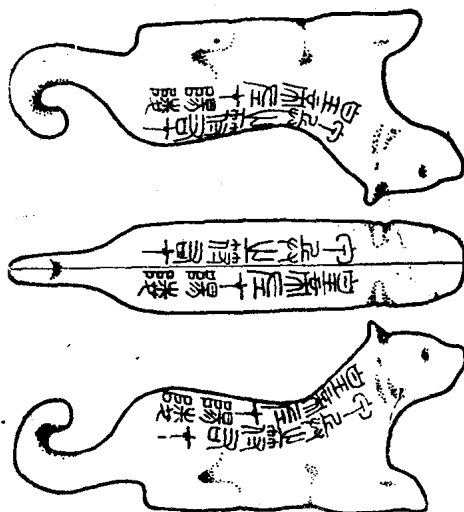


(图 一)

真伪或有无泄密。由于封泥处在检上,这种查看,就叫做“检验”或“检查”,也叫“验收”。书检或书函都由泥封上,因此,一通书信便被叫做一“封”书信。直到今天,我们写信,还用纸袋套上信笺后封口,这种方法也还是古代斗检封的沿续。

还值得一提的,是符节。它们也与书信有关。符节本是古代传信的凭证,是一种信物。《史记·魏公子列传》中记载了一个“窃符救赵”的故事,讲魏信陵君通过魏王的宠姬如姬窃得了虎符,取得了调动军队的权力。然后率领魏军帮助赵国解除了秦

军的围困。虎符,就是一种与军事有关的符。出土文物秦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(图二)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虎符的形制。所谓虎符,是以铜(或其他材料)制成的一对虎形凭证,二者相合而成一只虎,上面书有相同的文字,这是调动军队的凭信。节与符相仿,湖北江陵出土的鄂君启节(图三)就是一种起通行证作用的官方凭信。



(图二)

无论符或节，都由两块或两块以上相同的凭信组成，在使用时都要检验真伪。辨别真伪的标志之一，是把两块符(节)合在一起，看是否相同，上面的花纹或记号是否相契合。这种做法，与更为原始的传信手段契刻，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，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还得追溯书信的历史。



(图三)

书信的历史(一)

——前文字的通信活动

前文字，指文字产生以前的阶段。当原始人开始直立行走，进

行生产劳动,并产生了语言之后,人们之间的交际就日益频繁,内容也日趋复杂。互通信息的方式,在早期人类中间,除了语言之外,还可以动作表示,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身势语”——这是一种通过视觉接收的信息。口语和动作,只要是有意识地告诉、提醒别人,我们就不妨把它看作人类早期的通信活动,用语言的,我们称之为口信。

口信,可以由甲方直接告诉乙方,也可以通过第三方间接告诉乙方。第三方的传达,便是最早的使人——信使。

早期人类的通信活动,由于通信媒介的落后,往往不能尽如人意。语言是一种便利的工具,但语言无法保留,也无法传播到较远的地方去,即使有信使的传达,也会因各种原因使通信中断或变形。动作语言是视觉接收的对象,在通信活动中,也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。因此要达到通信的目的,必须借助于其他手段。

人类学家通过大量的调查证明史前社会的人类曾利用实物、契刻、图画等作为通信的工具,现在,这种做法还在某些没有文字的民族中保留着。

必须指出,所有这些工具,在史前社会中同时也用以记事。记事与通信不同之处是,记事属于个人的行为,以实物、契刻和图画作为记事的工具,都具有很强的任意性;而以这些作为通信工具,它涉及双方或三方,就必须在约定的条件下形成——这就是说,作为通信工具,具有约定性。

古代,南诏为了表示愿意归附唐王朝,送上“金缕合子一具,合内有绵,有当归,有硃砂,有金。……绵者以示柔服。……当归,永愿为内属。有硃砂者,盖丹心向阙。有金石,言归义之意,如金之坚。”(樊绰《蛮书》卷十)这一盒实物就是一封以实物“写”就的书信。其中的每一物件,都以其质地、颜色或名称的读音来表示意义。

解放前的景颇族，每逢械斗，山官、头人就用分发一块带毛牛肉(或更加以木刻)的方式来召集群众，称为“散牛毛”。因为景颇族每逢大事才杀牛，人们收到一小块牛肉，就知道将有重大事件发生。——这是用实物发“通知”。

用物件通信最为发达的形式，是景颇族的“树叶信”。树叶信不仅用于年轻男女之间的谈情说爱，一般人也用以互通消息。树叶信的基本方法，是把树叶或其他小物件固定地赋予某种意义。通信时，照要说的话的先后次序，把树叶等物件依次排列起来，捆成一束送给对方，什么树叶代表什么意义，在一定范围里人人都能了解。

比方说，景颇男女见面有互赠槟榔的习俗，在树叶信的开头也常以槟榔(或槟榔叶)放在上面，意思是“请吃槟榔”，表示友好。如在树叶信中放上两根火柴，表示“我要举着火把找你”。放上一叶叫做“拔业”(景族语译音)的树叶，由于“拔业”开花总是并蒂，就表示“让我俩常在一起”。这是用借意的方法表达感情。树叶信也用谐音的方法和语词相应，从而表达原来用语音表达的意义。如放上一对贝壳，贝壳在景颇语中读为“保锁”，与景颇语中“走”这个词同音，所以就表示“我要跟你走”；放上一种叫做“浪诺”的树叶，“浪诺”这个语音同时也是一种毒蛇的名称，所以这树叶就表示“你的心肠，不要学毒蛇那样狠”。树叶信就是依靠这“借意”和“借音”两种方法来表达感情的。

一封树叶信常由数十片树叶或其他物件组成，青年男女可以用它表达缠绵细腻的感情。树叶信大量采用了借音的方法，使可供表意的树叶不断增加，就好像一个人掌握的词汇量大语言自然能丰富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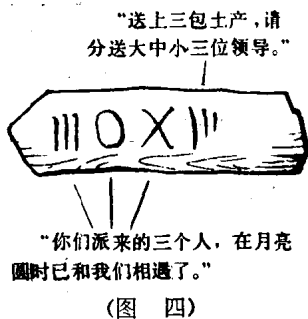
云南少数民族在丛林中行走，沿途砍去一些树皮作为标记，使自己及他人免于迷路；如果表示“此路不通”，则砍倒一棵小树或捆

孔一束荆棘，放在路口正中，以免他人重蹈覆辙。——这是以标记作为通信工具。

爱尼族在房门上竖起一交叉的木棒，表示家中有人生病或分娩，希望外人不要入内。——这同样是以标记作为向别人的警告。

古书记载远古人类曾经历了“结绳记事”的时代，“结绳”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保留。哈尼族买卖土地，用同样长短的麻绳两根，按田价多少打结，双方各持一根作为凭证。云南省博物馆藏有这样的麻绳一对，长约68厘米，上面各打九个结，两根绳子的结与结之间距离完全一样。这种契约式的结绳，是一种变相的“书信”。

在木块上刻几条道道，作为记事手段或凭证，是少数民族中常见的习俗。同样的手段也见于古书记载和考古资料。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黄帝之史仓颉……初造书契”，所谓契就是木刻。木刻也是通信工具。解放初期，中央慰问团在云南福贡收到一件傈僳族的传信木刻，长约6.6厘米，上面刻有四个符号：“Ⅲ”表示三个代表，“○”表示月亮，“×”表示相会，“Ⅲ”表示大中小三位领导。这件木刻就是一封信，意思是：“你们派来的三个人，在月圆时和我们相会，送上三包土产，请分呈大中小三位领导。”（图四）



各种通信手段还能综合起来运用。解放前夕，云南沧源岩帅地区佤族有人在上勐允地区被杀，财物被抢，岩帅先后三次送信给上勐允。第一次送去一块方块红糖，上面挖六个小洞及一个大洞，但不挖穿，表示“假如你们交出滇币6000元和凶手一人，我们的关系还可以和糖一样的甜蜜。”第二次是方形的盐一块，上挖一洞，而

且已挖穿，表示“我们的关系已经破裂，无话可言。”第三次则送去宣战木刻和鸡毛火炭，表示“我们很快就要来打仗。”

出土的虎符和鄂君启节，其实就是契刻与文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综合手段。

图画在没有文字的时代，也是记事和通信的工具。著名的北美印第安奥吉布华族女子的情书，就是一幅绘在赤杨皮上的图画：



图的左上一头熊是女子的图腾，左下一条泥鳅是男子的图腾——这便是发信人和收信人。旁边两条线是路径，两个三角垛是相会的帐幕，里面画有招他前去的标志。三个十字架表示周围都是基督教徒，说明四周的情况；三个圈表示湖泊，用以指示位置。

图画是一种比较方便的记事工具，用于通信也比较简捷明瞭。在文字产生以前，上述方法都和语言相配合，成为早期人类传递信息的媒介。

书信的历史(二)

——早期的文字信

只有文字产生之后，才有真正意义上的书信。

文字的产生，客观上是用来记录语言的，但从创造文字的动机来看，文字的产生首先应是为了方便交际。文字具有打破语言的

时空限制的作用，而让思想通过书面化的语言由此地传到较远的彼地，由今天传给较远的后代，——无疑，正是人们的通信活动和通信需要促使了文字的产生。

事实上，早期的文字，主要的用途便是通信。

汉字如果从甲骨文算起，已有 3500 年的历史。甲骨文的主要内容是卜辞。一般认为，卜辞是商代社会生活的实录，是重要的史料。但是，卜辞为什么要记录如此丰富的社会生活史料？卜辞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？却很少有人涉及这些问题。我们认为，卜辞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应用文体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记录，就其功利性目的而言，并不是为了供当时或后代的人作任何一方面的参考，事实上，卜骨也并非以档案的形式贮存的，而是在使用过后，经一定的阶段，“龟策敝，则埋之”，成为永久的秘密。既然如此，卜辞的内容就并不是希望传播开去或是流传给后人的了。我们认为，卜辞的本质是书信，是商代帝王及巫师与神鬼之间的通信。

我们只要读一下这些卜辞：

丙子卜，韦贞：我受年？丙子卜，韦贞：我不其受年？（《殷虚卜辞乙编》867）

“贞”是问，这两条卜辞一正一反地问“我”能否有好收成。

癸卯卜，今日雨？其自西来雨？其自东来雨？其自北来雨？其自南来雨？（《甲骨文合集》五、12870）

这是问是否下雨的卜辞，而且问得十分具体。

卜辞中，都有占卜者的贞问，这些问题问谁呢？当然是问神明。在龟甲兽骨上刻写问辞，并不是给凡人读的，而是供神明读的。神明的回答就是卜兆。

有些卜辞还记有王的占辞，那是王代替神明根据卜兆揭示的回答：

癸卯王卜贞：旬亡祸？在四月。王占曰：大吉。甲辰彤大

甲。癸丑王卜贞：旬亡祸？在四月。王占曰：大吉。甲寅彤小甲。〔癸〕亥王卜贞：旬亡祸？在五〔月〕。王占曰：大吉。（《殷虚书契后编》上19·4）

这是卜一句中吉凶的卜辞，其中王的占辞就是神明的回答。卜辞中还有所谓“验辞”：

甲申卜，受贞：妇好娩，毓（嘉）？王占曰：其唯丁娩，
妣；其唯庚娩，弘吉。三旬又一日甲寅娩，不妣，唯女。甲申
卜，受贞：妇好娩，不其妣？三旬又一日甲寅娩，允不妣，唯女。
（《合集》五·14002）

其中“三旬又一日甲寅娩，不妣，唯女”等二句是验辞。验辞的记录，既然不是给世人看，也就不是出生档案之类的性质。其实，验辞的记录是向神明汇报，也还是书信。卜辞涉及了农业、气象、田猎，征伐等方面的内容，但究其实质，不外乎人神之间的通信而已。联想到祭祀占卜时那种庄严而神秘的场面，卜辞这种书信的性质就十分明确了。卜辞是早期的一种特殊的书信。

我们常说的“金文”是指殷周时期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。殷代的铭文很简短，西周出现了长篇铭文。铭文的内容大致分为六类：1.祭祀典礼，2.征伐纪功，3.赏赐锡命，4.书约剂，5.训诰群臣，6.称扬先祖。在这些铭文中，已经形成了大致的固定形式，其语言相当程式化。（这与甲骨卜辞的程式化倾向有相当的一致性。）而且相当多数的青铜器铭文末段总有“子子孙孙永宝用之”之类的话，可见，铭文的目的是向后代子孙垂示祖宗的业绩。就此而言，铜器铭文也应看作一种特别的书信。

书信是一切应用文的基础，书信本身，则是使用最为广泛最为频繁的一种应用文。由于时代的进步，早期的卜辞和铜器铭文逐渐失去了它们的书信身份，在史学家的眼里，它们是一堆“史料”；同样，许多应用文体如契约、合同，借（欠）条等都不再具有书信的

资格；甚至由于使用频繁和分工的精细，使得通知书、介绍信、调令、委任状、奖状、命令、批示等都成为完全程式化的文件，在一般人的眼里，它们也不像是书信“家族”的成员。

毫无疑问，“书信”这一概念所包涵的内容，在各个时代是不同的。书信和其它应用文，也没有截然的界限。如封建社会里的一些文件，包括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、告、令、制、敕、诫，由臣子写给皇帝的奏议，以及用来宣战的文告——檄文，谴责别人的公开信——移文，军队行动时的安民告示——露布等，都与书信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即使在现代，通知、介绍信等“公函”也仍然没有摆脱书信的形式；电报的应用，改变了人们的通信方式，但电文的拟写，却仍然是书信的延续。书信是人们用以传递信息、交流感情的最基本方式之一。

书信的历史(三)

——形形色色的通信方式

汉代的诗篇《饮马长城窟行》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客从远方来，遗我双鲤鱼。呼儿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。长跪读素书，书中竟何如？上有加餐食，下有长相忆。”讲的是闺中少妇思念外出的丈夫，在接到来信后的一段情景。诗中所说的“双鲤鱼”，其实并非真的鲤鱼，而是一种刻成鱼形的匣子——也就是斗检封的一种。因而诗中这位送鱼而来的客，其实就是一位捎信的信使。把斗检封刻成鱼形，是因为在古代，“鱼”是作为男女之间爱情的一种隐喻、一种象征，所以，鱼书就是情书。于是乎，我们自然就理解了诗中的女主人公为何收到“双鲤鱼”后，就急急地“呼儿烹鲤鱼”了。

汉武帝时代的苏武出使匈奴，结果被匈奴无理羁押在北海（今

贝加尔湖，在苏联境内)达十九年之久。由于思念故国，他曾把信缚在一只南飞的大雁足上，结果这只雁被汉武帝捕获了，苏武的信也就寄到了。——这就是雁足传书的故事。

傣族长诗有“葫芦信”的故事，古书也有过风筝送信的记载，——可见，人们的通信方式是形形色色的。

我国古代，通信就受到国家的重视。汉代就已设置了传递官方文书的马和车，称之为“驿”，并在大道旁每三十里置一驿(站)，供往来信使休息和补充给养。唐代凡三十里设驿，驿有长，四方连结，共有一千六百三十九驿。可见对通信的重视。当然，封建社会里的驿有时并不用作通信，“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杜牧的诗句描画了封建帝王穷奢极欲的行径，也道出了驿站的另一职能。

通信是人们之间交流感情的一种活动，为了达到交流这一目的，通信就应具备三项重要的条件，这就是——迅速、准确和保密。有了文字，人们可以做到准确地表达思想；有了斗检封等手段，人们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保密；随着交通工具和道路条件的改善，人们也可以尽快地传送信件。但是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这些条件的改善却是十分缓慢的。于是，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达到目的。

为了让信快点儿送到，人们在重要的急信上附着鸡毛——表示“十万火急”。信使拿着鸡毛信，便知道信件的重要和紧急，尽快地进行投送。

为了保密——尤其是军事上的密信，古代采用了“阴符”和“阴书”的方式。阴符是用长短不等、形状各异的木片制成，分别表示“大胜克敌”、“破阵擒将”、“请粮益兵”等八种军事内容，接收者根据形制和约定的内容来调度军事。这种阴符保密性好，但由于不写文字，难以表达比较复杂的内容。阴书是用文字写在竹简上，把竹简断为三片，分别由三个人送达同一目的地，收信人得到阴书